

中国文化在中亚：历史与命运

侯艾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006)

摘要: 不同时期有多种文明形态对中亚文化发挥过重大作用, 但中国文化由于缺乏对周边垦殖的动力、对游牧社会缺乏吸引力等原因, 在型塑中亚文化面貌方面未能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 中国在精神文化方面对中亚民族的影响或许被低估了, 其许多因素都积淀在中亚民族传统中。今天中亚国家和中国有一种历史亲缘性和共同的文化问题, 中国文化已对中亚产生影响, 从文化多元主义立场出发进行双向交流, 将有助于各国人民达致幸福生活和走向中国走向世界。

关键词: 中国文化; 中亚; 影响; 交流。

中图分类号: 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19 (2017) 06-0135-06

在漫长历史时期内, 希腊、突厥、波斯、中国、阿拉伯、蒙古、俄罗斯、西方都曾程度不同对中亚产生影响。1991年后, 中亚开始了名为新“大牌局”的地缘政治争夺, 也展开了地缘文化、地缘文明方面的竞争。所有文化形态都在中亚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 尤以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在中亚基础良好, 只有中华文化的复兴几乎要从零开始。为何历史上中国在中亚经营多年, 而中国文化在型塑中亚文化面貌方面(尤其精神文化方面)未能产生重大影响? 这是研究中亚的史家必须回应的问题。日本学者认为, 中华文明与西域本已发达的文明、当时的西方文明相比并非更优秀的文化, 中国对于西域的经营不够彻底^①。至今无人对此作出回应。这种观点貌似有理, 但解释力不足。

1991年后中国与中亚新独立国家得以直接交往, 此前150多年里中国对近邻几乎出现知识断层。在推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的背景下, 中国与中亚的

关系仿佛是现实与历史重新连接, 因而对于相关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和深入检视。

一、影响中亚的诸文化形态

不同时期有多种文明形态对中亚文化发挥过重大作用:

古典时期的中亚经历了希腊化时期。中亚的园艺业和酿酒业都保留了希腊影响。

中亚、高加索的几十个突厥语族群(尽管人种和社会—文化面貌差异巨大)是一个历史现象。土耳其有意充当突厥语国家的领袖, 但经济、政治实力不足, 各国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巨大, 面临来自俄罗斯、伊朗等方面的竞争。

伊朗学者认为, 中亚大部都曾在波斯帝国治下。萨曼王朝对中亚影响最大, 王朝首都在布哈拉, 波斯语成为标准语。无论是宗教建筑、灌溉系统还是精神文化层面(诸如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 波斯文化都在中亚放射出璀璨光芒。1991年后, 塔吉克斯坦

收稿日期: 2017-11-18

作者简介: 侯艾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① [日本]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 郑元芳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年, 第54页。

的波斯文化认同上升，与伊朗、阿富汗等国联系紧密，有意建立“波斯语文化圈”（或可称为“雅利安人共同体”，塔国精英自认为是雅利安人后代）。

中国在中亚的开拓与经营，分为若干阶段。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与中亚一些部落和政权建立联系，商贸往来紧密，中亚部落受中国影响而建立一些不同形式的政治实体，但汉王朝在西域没有建立起稳固的行政体系。唐朝在西域实施有效管理，影响达到今天中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境内甚至阿富汗、印度北部，751年与阿拉伯军队的较量中落败，唐朝势力退出西域。明朝视中亚为外藩而维持松散的政治关系，与撒马尔罕、布哈拉、赫拉特等城市商贸往来频繁，同期的中亚迎来相对自足的发展时期，甚至科学、文化方面实现繁荣。清朝是中国与中亚关系的重要阶段，平定新疆，哈萨克、布鲁特（吉尔吉斯人）、巴达赫尚、帕米尔、阿富汗、尼泊尔等要求归附，被认为“成就之大，不亚于元，实过汉唐”^①。到清末，在中亚的藩属和领土被不断蚕食。

阿拉伯兴起后开始扩张进程，与罗马帝国、唐帝国尖锐对抗。唐朝势力从中亚退出，中亚开始伊斯兰化—阿拉伯化进程，到10世纪，伊斯兰教已占主导地位。阿拉伯文化对中亚影响巨大，在宗教形式下发展起科学、艺术、建筑等，阿拉伯文字、学术和法律广泛传播，如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成为阿拉伯文化中心。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阿拉伯国家试图在中亚恢复影响——提供资金兴建清真寺、神学院、伊斯兰慈善组织，接收中亚的神职人员到相关国家进修，提供宗教读物，等等，堪称再伊斯兰化—再阿拉伯化进程。

13世纪中期开始的蒙古征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蒙古人几乎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各民族频繁交流。蒙古人征服的基本上都是当时的文明世界，往往被征服者所同化，如建立汉化的元朝、罗斯化了的金帐汗国，在中亚被大规模突厥化。蒙古人参与了欧亚大陆许多民族的民族进程，各民族融合进程加快，中亚前现代民族的轮廓日渐清晰，蒙古化时期在欧亚各国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等方面

都打下烙印。

俄国是中亚的后来者。从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期，中亚建立了浩罕、布哈拉、希瓦汗国、哈萨克汗国，处在中、俄两大帝国之间，内部矛盾重重。19世纪上半期，英、俄在中亚展开激烈争夺，清帝国却是被侵害的客体。从俄帝国到苏联时期，俄语成为中亚各民族的第二母语，俄罗斯文化影响深远。中亚民族借助俄语走向现代化，分享俄罗斯文明的成就。苏联时期是中亚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决定性阶段，是1991年后获得主权独立的政治—法律基础、社会文化基础。随着中亚民族文化复兴及“去俄罗斯化”进程，加上来自其他文化的强劲竞争，俄罗斯文化在中亚有所衰落。

1990年代开始，西方文化对中亚发挥影响。推行激进西化路线乃是多数后苏联国家的主要特点，西方文化深刻影响中亚精英和大众。在各种手段的配合下，不少穆斯林改宗基督教^②，这是一个独特现象。2001年后，中亚国家与西方合作紧密，对西方期望很高，引起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担忧。2005年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爆发“颜色革命”，西方与俄罗斯的地缘对抗加剧。随即西方与中亚国家关系恶化，西方文化扩张势头有所遏制。

二、中国文化在中亚：比较分析

中国文化在中亚未能产生决定性影响，有多层次的原因。

首先必须明确，中亚地区与不同时期活动在中亚的民族并不总是一致。今日中亚民族与古典时期、中世纪、近现代的中亚民族存在关联，但没有直接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中国与中亚地区联系始终紧密，作为历史—文化概念的中国人和中亚民族的联系却存在断档。当然，今日中亚国家都在论证：本民族是该国土地上一以贯之的原住民，其他民族可能是外来人。

唐朝的军事失败是战略性、决定性的。即使盛唐也面临交替兴起的周边民族的有力挑战，唐朝与邻族处于不同的兴衰周期，向西拓展受到牵制。《新唐书》写“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

① 陈希豪编著：《新疆史地及社会》，南京：正中书局，1947年，第5页。

② А.Ярко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религий Кыргызстана, http://www.kyrgyz.ru/articles/kyrgyz/yarkov_ocherk/

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公元650年唐军与吐蕃军的大非川战役是决定性的，唐军败后吐蕃甚至不断蚕食唐朝在西域的属地，成为干扰唐朝控制中亚的重要因素。薛宗正论述唐军失败的原因：到8世纪时，唐朝“应变、应战能力已经难于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了”。经过长期扩张，大食已将乌浒水域诸国蚕食、吞并，河中诸国也都归附大食，唐朝属国所剩无几，只有东拔汗那和葛逻禄两国。此外，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军队存在技术差距，唐朝在中亚犯下战略错误^①。怛罗斯战败后，唐朝陷入“安史之乱”，无力恢复西域领地。

考察他国殖民历史，多半以商人寻求原料和市场的逐利活动为原始驱动。而中国社会以农立国，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农业区域稳定富足发达，汉唐时还未形成能够显著影响政治生活的商人阶层和群体，人们安土重迁，加上将行孝道与远行对立的文化根源、交通艰难的物质根源，对殖民发展缺乏积极性。拉铁摩尔指出：中原王朝的外贸动力不足，始终以农业为根本——有时候还下令中止贸易。因此中国王朝对中亚的政策是为了控制中亚的绿洲及部落，建立对抗游牧民族的联盟，或对绿洲进行防御性占领，以免游牧民族将其作为根据地。^②按汤因比的观点，游牧民族随季节变化而向农耕民族发起周期性冲击，是长期发挥作用的地缘政治因素，大大制约了中原王朝向北方和西北部拓展。游牧民族将生产和打仗结合的组织方式是农业社会难以做到的，在周边也日趋活跃，向农业文明的主动进攻达到极点、占尽优势。而中国的封建王朝缺乏对周边垦殖的动力，历代王朝对于周边的经营并不是为了占领殖民地，多是在被游牧民族侵扰、深受其害之后主动出击，越境用兵或开拓往往是迫不得已的，始终缺乏对付游牧民族的明确战略与坚定意志。历史上偶有锐意开拓的统治者，但缺乏连续性，也未必得到知识精英的认同，继任者往往诟病前代为劳民之举、速祸之由，因而前功尽弃。尤其宋朝以后重视读经书、知礼仪的文人，几乎天然、本能地就是

和平主义者。并且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于与异民族交往缺乏正确心态，对周边“蛮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并不主动将其纳入政治轨道，国力强大时也不过致力于维持朝贡体系，往往不重视对边远游牧民族（外藩）的实际控制，国力衰弱则设法维持朝贡体系，制造虚假的“万国来朝”盛况。

游牧民族接受中国文化的前提往往是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否则中国文化很难持续影响。但在反复较量中，游牧民族积累了丰富经验，甚至会刻意避免被同化。例如突厥首领默棘连试图让突厥部落定居，建立城市、修建道观寺院，墩欲谷坚决反对：“……若城而居，战一败，必为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强术。”（《新唐书·突厥传》）默棘连警惕唐朝的同化策略：“唐人富有银、粟、帛，往往用其甜言，且拥有致人衰弱之财富，供其挥霍……”^③游牧民族接受中国文化另一重要前提是汉民族与中亚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而以清朝为例，甚至有意将汉族与他族实施社会—文化隔离：在新疆实施汉族与穆斯林族群隔离^④，在藏地实施藏—汉隔离^⑤，在内蒙古等地实行蒙—汉隔离，等等。该政策执行到1840年之后。这种做法不利于边疆族群形成中国人意识，危及国防。

中华文明曾对周边民族产生巨大影响，但其持续影响需要时间长度和历史延续性，尤其需要形成稳定、中坚的士阶层和自身的社会政治传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可以扎根，这是中华文明影响周边的基本模式。但在中亚，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一些传播劣势：儒家学说是政治哲学、道德伦理，对游牧社会缺乏吸引力；儒家代表是受儒家教育的士大夫阶层，西域只有少量官员、商人、军士。而伊斯兰教具有明显优势：伊斯兰教不但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还是政治—法律制度，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配合以经济和超经济强制手段，很快成为中亚民族的基本信仰，此前繁盛的拜火教、聂斯脱里教、佛教等很快销声匿迹。

与中国鲜明对比，俄国在数百年的殖民征服中

① 薛宗正：《中亚内陆大唐帝国》，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1、285页。

②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95页。

③ [丹麦]汤姆森：《鄂尔浑碑文》第117-118页，转引自[法]格鲁赛：《草原帝国》，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49-150页。

④ 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

⑤（清）那彦成著，宋挺生校注：《那彦成青海奏议》，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9-181页。

积累了丰富经验，不仅有明确、连续的战略，在策略上也有许多成功之处；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特点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惯于迁徙，几乎在所有新征服地区都有大批俄罗斯族自发移入，承担了“民间殖民”功能；俄国对被征服民族直接统治，使其尽快实现与俄罗斯族的经济、社会、文化融合，明确以同化土著民族为目标。中亚各族尤其在苏联时期取得长足进步。苏联政府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反对“殖民者作风”的举措一度矫枉过正，苏联领导人 А.И. 李可夫的说法很有代表性：英国依靠殖民地发展宗主国，而我们却依靠宗主国来发展殖民地，俄罗斯几乎成为非俄罗斯民族的国内殖民地。^①以苏维埃化为形式，中亚民族文化发展达到新高度。

三、重估中国文化对中亚的历史影响

任何文化传统都可进行知识考古学梳理，回到原点重新审视观照。当代人倾向于低估古代人的活动能力及各族间的交流交往能力。汉朝张骞通西域的影响深远，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国与西域建立联系后，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双方都迅速走向繁荣。中国与西域连接起来，而西域传统上与波斯（安息）、大秦及欧洲国家联系紧密，张骞通西域间接联通亚欧。而此前中国与中亚的交往显然不会是全然一张白纸。例如《穆天子传》证明，周朝时中国先民就到过中亚。一些人对此不认可，但又无法解释书中记述与新疆、中亚的山川地貌、物产风土完全吻合的情形。再如《山海经》中狮身人首的动物“奢比尸”，当是埃及的斯芬克斯。按照常识（实际可能是偏见或刻板印象），无法想象当时中国人有能力与遥远的埃及建立联系。类似事例尚有很多。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真实图景需要深入研究，更需要观念突破。

中亚本身是文明的创造者、接受者，也是文明的中介：中国文化经由中亚传播到西亚、欧洲等地，印度、波斯、阿拉伯、乃至欧洲文明成果也经由中亚

对中国发生影响，使欧亚大陆的文化成为共享的文化。关于中国和中亚在物质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已论述很多。如葡萄、苜蓿、石榴、核桃等许多作物都来自西域，“魏晋以来，凡草木之名冠以胡字者，其实皆西域物也”^②，名称带有“胡”字的事物多半来自西域，如龟兹所产铁称为“胡铁”、插头金称为“胡插金”；大量乐器自西域或由西域传入，如箜篌、箏、琵琶、胡笳、胡篪、胡笛等，一些西域乐曲和舞蹈传入中国而引起中国乐舞的变化，“新的乐器的输入，新的乐器的出现，这就必然要改变歌舞的内容”^③。中国与中亚、中东的一些农业生产技术存在关联，如据王国维考证，中国的凿井灌溉技术传到西域，甚至间接传到波斯；而伯希和推断，这种凿井灌溉技术是反向传播的，即经由波斯传到中国。^④

丝绸是中国对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中亚许多考古遗存与中国相关，有大量丝绸出土，一批精美丝绸织品中个别质量明显劣于其他，可能是当地自产。^⑤中国的丝绸纺织技术传到粟特，7世纪时费尔干纳也开始生产丝绸，其品质甚至得到中国人好评。8世纪叶尼塞河流域的吉尔吉斯人墓葬中发现三耳银餐具，类似唐朝餐具。中国产的铁也曾出口中亚，并教会大宛人铸造铁器。七世纪50年代造纸术传到中亚，8世纪传到阿拉伯国家和西方。费尔干纳地区还向中国人学会锻铁、造纸、播种水稻。茶叶是中原王朝与中国北方、西域民族交易的大宗商品，欧亚大陆各族将茶叶作为饮料是受到中国影响。

物质文化往往包含精神文化实质。例如镜子也是出口中亚的大宗商品。在古代中国人观念中镜子有避邪功能，墓葬有放置铜镜的礼俗。大批中国铜镜销到域外，中亚地区（如乔尔库、苏尔哈、伯克巴兹、卡拉布拉克、舒舒库姆等）甚至伏尔加河、高加索地区都发现了类似铜镜^⑥，学者们认为是以中国铜镜为原型、结合当地纹饰制作的。在墓中放置打碎或完整

① С.А.Павлюченков,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М,2002г,С.70.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07页。

③ 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2页。

④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620页。

⑤ Бернштам А.Н.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М.-Л.,1950//МИА, №14.С.65.

⑥ Баринаова Е.Б.Китайс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материальную культуру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II в.до н.э.—начало XIII в. н.э.),<http://www.humanities.edu.ru/>

的镜子的葬俗或许表明,他们认同中国人的文化观念。

中国史书为没有文字的中亚等地民族记载了历史。从司马迁开始,中国史学家已将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波斯人、粟特人等纳入视野。汉文文献与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献一起,成为研究中亚历史的宝贵史料。无论是西方的中亚史家(如格鲁塞等),还是俄国的比丘林、巴尔托里德,乃至当代突厥学名家古米廖夫,都极为倚重汉文文献。1991年后,中亚国家学者加强对汉文文献的利用(从《史记》《汉书》直到《明实录》《清实录》等),借以建构本民族国家的历史,服务于本国史学和意识形态建设。这些文献需要反复解读,用于揭示周边民族历史面目的潜力巨大。

欧亚大陆民族产生和演化图景需要重构。中国曾是欧亚许多民族的发祥地,今日欧亚大陆各族的遥远祖先(突厥语族、蒙古语族乃至部分欧洲民族)都曾在中国境内生聚繁息。如保加利亚有史学家认为,保加利亚人的祖先可能与中国史籍中“并州胡”、部落稽人(或写成步洛坚人、步落稽人)存在关联。^①古代保加利亚人用十二生肖历,有保加利亚学者认为,中国乃至世界许多民族运用的十二生肖历源自阿尔泰民族,如中国史籍中乌桓、鲜卑等族。^②

血统纯粹的民族是不存在的,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历史上中国人和中亚民族曾有长期混血的历史,中国人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亚民族(如吉尔吉斯族等)的形成进程,不同时期都有异族人融入中华民族。例如元朝曾将大批罗斯军士安置在中国(《元史·文宗本纪》),将吉尔吉斯人安置在山东曹县。许多中亚、中东的异族人来到中华经商或定居,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纯粹的民族文化多半也不存在,许多所谓民族文化首先是各族文化交流的成果,之后又被各族共有共享,而在后来的历史进程,在一些民族中发扬光大,而在他族中荡然无存。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许多原属华夏的礼俗失传,而在周邻民族中完整保留;反过来,周邻民族失传的文化礼俗,或许也可以在中国找到。这是文化传播交流中的常见

现象。例如:来自古代中亚的许多乐器在今日中亚已消失,而在中国发扬光大,成为中国的民族乐器。真正起源于中国的民族乐器尺八传入日本,在今日中国已失传,成为日本的民族乐器。相扑本是唐朝的体育活动,最后在中国消失,在日本完整保留,成为日本的国技。研究唐代建筑,需要赴东洋日本寻找相关的建筑标本。

再如,关于中亚思想家尤素甫·巴拉萨贡、诗人阿拜的族属在相关民族间展开争夺,伊朗、阿塞拜疆都认为高加索的著名诗人尼扎米属于自己民族。但事实证明在古代、中世纪并无严格的民族国家藩篱,不同族群共享文化,其密切程度超乎想象。许多人注意到巴拉萨贡经典著作《福乐智慧》中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有许多契合,实际上其思想受到了儒家经典尤其宋代儒学的巨大影响,吉尔吉斯前总统阿卡耶夫指出巴拉萨贡思想曾与来自中国的思想发生过交流和碰撞。类似例证举不胜举。

由上可知,中国在精神文化方面对中亚民族的影响或许被低估了,许多原本属于中国的精神文化因素都积淀在中亚民族传统中,经历史涤荡已难分彼此。

四、中国文化在中亚的前景

有人对中国文化在中亚的前景并不看好,认为中亚的波斯语族和突厥语族很难接受虽然丰富却异质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影响仅限于与汉族聚居的民族。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对他国的影响力有限,因为中国展示的更多是传统文化而非现代文明。^③

探讨此类问题时必须明确中国文化与相关各国交流时呈现为何种文化形态,同时也必须明确当代中亚国家的精神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中国文化是包括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信仰的多元文化形态,也还有各种地方性的朴素信仰和崇拜;作为新命旧邦,中国需要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国应该展示当代文化成就,后起的中国在掌握先进科技方面展示出不俗的能力。中亚各国同样是多元文化形态:政治精英和学术文化精英服膺现代科技、文化和西方政治观念、生活方式,在哲学、价

① Живко войников,«Булоцзы -кто они? Сведения о народе болгар из китайских источников»...<http://www.bulgari-istoria-2010.com/>

② Живко войников,Древнеболгарский календарь этимология названия месяцев и годов,<http://www.bulgari-istoria-2010.com/>

③ 赵华胜:《形象建设:中国深入中亚的必经之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价值观、意识形态领域认同西方哲学、价值观；大众虽以伊斯兰教为基本信仰，而这种信仰和认同只是粗浅的、礼仪性的。^①例如阿卡耶夫曾到麦加朝圣（1990年代前后许多政治精英都曾朝圣），也曾拜会罗马教皇和东正教牧首。这些精英只是为了争取国内群众支持，争取外部资源，尤其是资金充裕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资金支持，获得参与国际事务的平台。更多人实际仍然保留着朴素的自然崇拜：长生天崇拜、先人崇拜、各种自然崇拜、萨满教遗留等。1980年代苏联学者的田野调研证明，许多吉尔吉斯人仍然保留前伊斯兰信仰，诸如至高无上的天神“腾格里”、主管地和水的天神“叶尔苏”、护佑妇女儿童的神“乌麦”女神，等等。^②即使1980年代后期以来伊斯兰复兴加快，传统的多神崇拜也得到某种复兴。从中亚—高加索国家的社会文化特征来看，无疑都是世俗社会。或许可以说，中亚国家与中国面临共同的文化问题，甚至还有一种历史亲缘性。

中国文化已在中亚产生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古老、连续的文明形态，中国文化自有其强大魅力。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许多中亚青少年学习汉语，相关国家除了建立汉语系、中国文化中心，通过各种途径来华学习的学生也不断增长。这些了解、熟悉、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将成为沟通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桥梁，使相互间的心灵更加亲近。许多中亚国民还在苏联时代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好的认知，中亚许多城市都有教授中国武术、气功、中医按摩的中心，中餐受到欢迎，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人主演的中国功夫片和一些中国影视剧、流行歌曲也受到中亚国民的喜爱。

一些低发展的东方学科（诸如周易、阴阳学说等）可以打破科学的话语霸权，作为新的知识来源和思维

方式，为全人类造福。后苏联国民普遍对中医有很好的认知。俄罗斯族和中亚民族也有自己的民族—民间医学，也有许多特效的康复方法，正可与中医互相补充。需要指出的是，中亚有许多植物性、动物性和矿物性药材，中国和这些国家可以充分合作，共同造福各国人民。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中亚国民认可中国的医疗技术。新疆多家公立医院收治大量中亚的患者，内蒙古也建立中蒙国际医院收治蒙古国病患，许多邻国国民在中国得到医疗服务。对于实现中国与中亚国民的“民心通”来说，治病救人是拉近彼此心灵的重要途径。

中亚—高加索国家不少人到中国旅行后带回“转运竹”，或供放“招财童子”、招财猫之类吉祥物，这是对中国人朴素文化观念的认同。2017年3月塔吉克斯坦报纸文章《车的风水》讲到：车是有生命的，应该恰当对待，要避免车祸或车被损害，必须注意风水。例如，车主是金命则应该买白色车，是水命则应该买黑色车，是火命则应该买红色车，等等。^③实际上是一些有关阴阳五行的粗浅知识。此外，从1980年代末开始，苏联、俄罗斯都出版了大量阴阳五行、风水学著作，并涌现出某种“风水热”，这其实也是世界性风潮。

从文化多元主义立场出发，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应是双向的，将有助于各国人民达致幸福生活。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各民族文化被分成不同等级，强势文化体现了国际政治中的强势地位，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是一种倨傲的碾压，小族、小国的文化被贬低为某种低劣的地方性—部落性文化。而中国要走向世界，不仅应该展示和传播本国的优秀文化，也应该谦逊学习所有民族、国家的优秀文化，广收并蓄。

责任编辑：董宇宇

① Асылбек Бисенбаев, Не вместе: Россия и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Пб, 2011 г, С.101.

② Т.Дж.Баялиева,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пережитки у киргизов и их преодоление, Фрунзе, 1981 г, С.12.

③ Фен Шуй автомобиля: цвет, талисманы для автомобилей // Дайджест Пресс, 20 марта 2017 г.